

政治研究

美军占领统治时期冲绳社会运动生成机制研究

江知蔚¹, 胡 澎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 要: 1945 年冲绳岛战役后, 冲绳经历了美军长达 27 年的占领统治。此间当地社会运动呈现出规模广泛、持续性强与组织结构复杂等鲜明特征。基于政治过程理论的分析表明, 冲绳社会运动的动因主要源于美军以军事利益为核心的二元统治模式在意识形态、制度程序与治理绩效等方面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这一统治结构在实践中压制了地方自治空间, 加深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进而激发出广泛而持续的社会抗争。在此基础上, 冲绳社会借助地方自治体系的制度嵌入、跨阶层联合以及灵活的抗争话语策略, 逐步形成了兼具广度与制度渗透力的抗争网络。冲绳的抗争经验不仅为理解边缘地区的集体抗争提供了重要范例, 也为当代反基地运动与地方自治抗争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 冲绳; 社会运动; 美军基地; 政治过程理论

中图分类号: D56;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25)04-0001-22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5.04.001

近年来, 冲绳的美军基地问题再次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围绕普天间基地搬迁的争议、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民意的对立以及反对驻日美军基地的抗议活动频频发生。这些现象不仅使冲绳问题成为日美关系中的敏感议题, 也凸显了冲绳社会运动的持续抗争传统。战后, 美军统治下的冲绳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美军基地的建设以及美军统治的长期化催生了其各类社会运动。其中, 有两个具有标志性的运动: 一是 20 世纪 50 年代冲绳民众反对美军强征土地的“土地斗争”; 二是贯穿整个占领统治时期的冲绳民众反对美军统治, 争取“重返”日本的“复归”运动。从“土地斗争”、“复归”运动到当代反基地行动, 冲绳社会运动始终围绕美军统治的不公正展开, 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与延续性, 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动

收稿日期: 2025-05-29

基金项目: 2023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琉球门中制与宗族社会研究”(23BSS049)

作者简介: 江知蔚,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主要从事战后冲绳历史与社会运动研究。

员能力，成为研究边缘地区社会抗争的重要样本。

以 20 世纪 50 年代反对强制征地的“土地斗争”为起点，冲绳民众初步凝聚了反抗殖民统治的集体意识；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复归”运动达到高潮，社会诉求从具体的土地权益拓展为“民族解放”和“重返日本”。随着日本政府确立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战略，“复归”前景与美军基地的长期存在挂钩，冲绳社会运动的目标也逐渐从单一的施政权回归转向更复杂的“冲绳斗争”，冲绳社会运动的诉求开始从单一的“复归”扩展为更加复杂的抗争形式。

尽管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个案叙述或单一视角分析，对于冲绳社会运动的产生动因缺乏系统性探讨。例如，大野光明在《冲绳斗争的时代 1960/1970》中以丰富的历史资料重构了战后冲绳社会运动的行动现场，突出了复归运动与反基地抗议的交织，但更侧重于运动过程的再现，对其结构性动因缺乏理论化分析^[1]。小林武分别就“裁判移送事件”^[2]与“宫古岛农民镇压事件”^[3]进行了深入考察，揭示了美军统治下司法压制与对农民运动的暴力应对机制，贡献在于从法制史角度补充了社会压制侧的理解，但对运动本身的动员机制与群众参与因素关注不足。芝田秀干聚焦 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运动，展现了学生群体在冲绳问题中的意识形态转向与组织化过程，然而其分析仍主要停留在世代主体的意识变化层面，缺少将学生运动与整体社会结构变化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4]。村冈敬明的研究则从“岛屿总动员斗争”出发，探讨了冲绳居民意识的历史性转变，强调了民众认知在抗争中的能动作用，但对政治机会、组织动员资源等变量的讨论较为薄弱^[5]。

综上，现有文献虽在运动史料研究、个案深描等方面各有贡献，但缺乏一个整合政治结构变迁、制度资源分布与社会认知重构的系统分析框架。因而，有必要引入政治过程理论等结构行动整合视角，以更全面地理解战后冲绳社会运动的动因机制。基于此，本文选取“土地斗争”和“复归”运动为案例，运用政治过程理论，从政治机会结构、组织动员与认知解放三方面，探讨美军占领下冲绳社会运动的生成机制与发展逻辑，借此深化对冲绳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变迁的理解，为类似地区的社会运动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启示。

一、政治过程理论对冲绳社会运动的解释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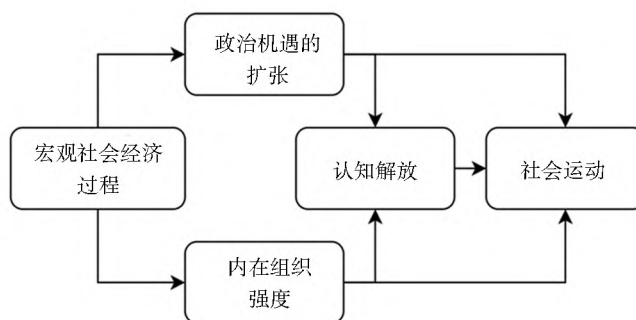
社会运动自被纳入学术研究范畴以来，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学界对社会运动的阐释框架尚未形成统一界定，不同学者基于理论立场与研究路径的差异，从不同意义层面讨论社会运动。麦卡锡和扎尔德认为社会运动是“由人们自愿参与并支持的集体行动，旨在推动社会变革”^[6]。道格·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是“被排斥的群体为争取共同利益，通过体制外手段整合政治资源、发起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行为”^{[7]37}。西德尼·塔罗认为社会运动

是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和使人产生共鸣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 能发展出对强大对手保持持续挑战力的斗争政治事件”^[8]。查尔斯·蒂利认为, 社会运动是一种独特的实现大众政治的方式和手段, 并提出其所包含的三个要素: (1) 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公开的诉求伸张运动; (2) 进行一连串的诉求表达, 其形式包括专项协会、公共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等; (3) 价值、统一、规模、奉献的公开表达^[9]。赵鼎新将社会运动定义为“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10]。上述社会运动定义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 但大多涵盖了一些基本要素, 即“集体行动”“抗议对象”“长期性”“组织化程度”“追求某种程度的社会变革”“制度化程度”。这些要素都可以在冲绳反对美军统治和军事基地的运动中看到。

除了传统的反对建制的社会运动外, 在美军占领统治期间冲绳也爆发了诸多具有“新社会运动”色彩的运动, 包括反战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等。所谓“新社会运动”, 指的是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诸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 这些运动具备身份政治、去组织化、去经济化、斗争对象非具象化等特点^[11]。冲绳的社会运动虽在议题选择上与西方新社会运动存在表面相似性, 但其实质展现出鲜明的抗争性质。与西方“新社会运动”以制度或文化观念为批判对象不同, 冲绳的社会运动始终锁定具象化的军事殖民机器: 反战和平运动通过组织罢工明确反对美军基地参与越战, 环保运动聚焦基地污染展开抗争, 女权运动则依托司法援助网络系统追究美军性暴力的责任。

观察 1945 年至 1972 年冲绳社会运动的发展脉络发现, 其并非一次性爆发的“事件”, 而是一个在特定结构条件下逐步积累力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如何起始、如何扩展, 其间的机制如何运作, 是本文关注的关键问题。为此, 有必要引入一种能够揭示结构性变迁与行动逻辑互动关系的理论视角。相较于强调自发性或文化动因的新社会运动理论, 美军占领统治下的冲绳社会运动更贴近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范围。在该研究路径中, 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于 1982 年出版的《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 (1930—1970)》中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7]。麦克亚当指出, 社会运动的产生根植于一系列宏观社会经济过程 (broad socioeconomic processes), 包括战争、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变迁以及国际政治变化等, 它们共同推动了既有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社会运动兴起的三大核心要素: 政治机遇的扩张 (expand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内在组织强度^① (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认知解放 (cognitive liberation)。图 1 展示了社会运动产生的政治过程模型。

① 文中“内在组织强度”与“组织动员能力”系同一概念, 均指组织的制度化程度、成员参与稳定性及资源整合能力。在理论部分采用前者以对应原典用语, 分析部分使用后者以增强操作性, 二者可视为同义。

图 1 社会运动兴起的政治过程模型^[7]⁷⁶

所谓政治机遇的扩张，是指重大的社会变迁导致既有权力结构的松动，为被压制群体创造了更有利的抗争环境：一方面使得挑战者享有更优势的议价空间，另一方面则提高了执政者的镇压成本。内在组织强度指的是在运动爆发之前，被边缘化群体内部已存在形式多样的基层组织或潜在组织网络。这些组织能为动员提供关键资源，如领导人才、传播渠道、参与者基础。认知解放意味着潜在行动者打破了对现有统治秩序合法性或不可改变性的固有认知，开始认识到自身遭受的不公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并相信通过集体行动有可能挑战甚至改变现状。

政治过程理论一经推出受到社会运动学界的广泛欢迎和应用，但也遭遇部分批判。首先，该理论中“政治机遇”这一核心概念被批评者指出存在界定模糊、弹性过大的问题。其次，批评者指出，对于运动动员结构的分析，也应该涵盖运动酝酿以及发展过程中建立的运动组织。最后，政治过程理论过分强调结构性变量，而对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集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以及文化意义的建构作用关注不足，且不能适用于新社会运动的解释。为回应这些问题，麦克亚当在 1999 年出版的《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第二版中，引入文化与情感变量，并对“政治机会”概念进行更精细和多维度的界定，同时拓展了对组织动员结构的理解^[7]。这些修正显著增强了该理论对运动微观动员过程、文化框架建构以及情感驱动力的解释力，使其更适用于分析多元的抗争形态。

本文以政治过程理论为出发点，结合战后冲绳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变迁，考察冲绳社会运动的发生逻辑与发展轨迹。通过对美军占领、地方自治恢复、冷战格局变化及国际舆论支持等变量的梳理，着重阐述冲绳社会如何在政治机会结构拓展、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及认知解放发生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受害者”向“抵抗者”的主体性跃迁，进而揭示出其社会运动生成与演化的机制。

二、美军占领统治时期冲绳社会运动概况

1945 年 3 月 26 日，美军登陆庆良间群岛，并发布“美军军政府布告第 1 号”，宣布解除日本对“南西群岛及附近海域”的行政管辖权，设立海军军政府接管该地区^[12]。此后，美军陆续进驻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和奄美群岛，并分别设立了“冲绳群岛军政府”和“南、

北部南西群岛军政府”进行统治^①。战后初期, 美军在琉球群岛并未建立统一的军政府, 而是根据进驻时间的不同分别设立多个独立军政府, 各自管理辖区。

这一临时性、多中心的统治结构持续到 1950 年美军对冲绳统治体系的整合。1948 年以后, 随着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逐步形成, 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冲绳战略地位。1949 年 5 月 6 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 NSC13/3 文件, 要求对“北纬 29°以南的琉球群岛、马库斯岛、孀妇岩以南的南方诸岛实行长期的战略控制”^[13], 该文件随后成为杜鲁门政府对日占领与媾和政策的指导性文件。随着美国远东政策的确立, 美方加大了对冲绳基地的建设投入, 使其真正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基石”。1950 年 12 月, 远东司令部下令将原军政府体制改组为“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14]。虽然冠之以“民政”之名, 民政府较之军政府并未有任何实质改变, 仅仅是将“军政长官”替换成“民政长官”, 民政府内所有要职依旧由现役军官担任, 其军政统治的实质并未改变。

与此同时, 冲绳主权问题也在国际场域成为焦点。1951 年 9 月在旧金山召开的所谓“对日和会”中, 冲绳地位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美方代表杜勒斯提出“剩余主权论”(Residual Sovereignty), 即允许保留日本对冲绳的形式主权, 使冲绳有可能纳入联合国的托管体系, 由美国作为唯一管理当局实质上实现对冲绳的排他性统治^[15]。9 月 8 日, “旧金山和约”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等战胜国参与签字的情况下得到通过, “旧金山和约”对冲绳的地位做出如下规定:

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 29°以南的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的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硫磺群岛)及冲之鸟礁和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体系之下, 而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的任何提议, 将予以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就此采取肯定措施之前, 美国将有权对这些岛屿之领土及居民, 包括其领海, 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司法权。^{[16]124}

“旧金山和约”第二章的第三条为美国统治冲绳的“合法性”提供了背书。1952 年 2 月 29 日, 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副长官贝特勒签署第 13 号公告, 设立覆盖群岛全域的自治政府——琉球政府(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17]。美军统治自此转入制度化轨道, 形成由美方主导的“二元统治体制”^②: 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掌握实际立法、行政、司法权力, 琉球政府则作为象征性自治机构运作, 其首长由美军任命, 法令需经美军批准后才能生效。在这一统治体制下, 美军在冲绳广泛修建军事基地, 并实施土地征收、设施扩建、驻军轮换等政策, 引发民众不满。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 围绕美军征地政策和地方主权问

① 战后初期, 美军在琉球群岛并未建立统一的军政府, 而是根据进驻时间的不同, 分别于 1945 年 4 月 5 日、12 月 8 日、12 月 28 日以及 1946 年 2 月 2 日在冲绳本岛(冲绳群岛军政府)、宫古群岛及八重山群岛(南部南西群岛军政府)、奄美群岛及吐噶喇群岛(北部南西群岛军政府)设立军政府进行统治, 各军政府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② 据《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2 年 9 月)记载, 1952 年 2 月 29 日和 1953 年 12 月 25 日, 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先后颁布第 68 号令(即《琉球政府章典》)与第 27 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之布告), 擅自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划入“琉球列岛”托管范围内。该行为违反国际法原则, 毫无法律依据, 中国政府始终坚决反对。

题，冲绳社会逐渐酝酿出以土地权益和政治归属为核心诉求的群众抗争。

在美军统治的压抑性结构下，冲绳社会相继爆发了两场具有标志性的群众抗争，即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斗争”与贯穿整个占领时期的“复归”运动。这两场运动不仅构成战后冲绳抗争的关键节点，也为后续社会动员积累了重要的组织与认知资源。

“土地斗争”爆发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接起因是美军提出“地租一次性支付”政策，企图永久性买断大规模军用地，严重侵犯冲绳民众的土地权，引发强烈反弹^[18]。1953年真和志村发生“刺刀加推土机”式强征事件后，抗议迅速蔓延全岛^[19]。冲绳立法院提出“守土四原则”，地方政府、市町村议会与军用地团体组成“协议会”，发起总辞职、居民大会、访日请愿等多种形式的抗争^[20]¹²²⁻¹²³。1956年美方提出的《普莱斯报告》主张强化征地制度，进一步激化对立，抗议持续至1957年达成阶段性高峰，尽管未能阻止征地制度的全面实施，但美军被迫延缓部分计划，并做出部分让步。土地斗争不仅实现冲绳社会首次大规模跨层级动员，也推动政治意识觉醒，为后续“复归”运动积累了组织经验与制度动员范式。

“复归”运动是战后冲绳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运动，核心诉求是终结美军统治，实现施政权“归还”日本。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后，冲绳被排除于日本宪政体系，引发广泛政治不安，“复归日本”逐步成为跨阶层的社会共识。屋良朝苗作为关键政治人物，提出“生活在宪法第九条庇护下”的口号，将和平主义与民族归属相结合，成为运动象征^[21]。“复归”运动整合了地方议会、教师会、妇女团体、学生组织等多元力量，通过签名、集会、县议会决议与访日请愿等方式持续表达诉求。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政府接受“带基地复归”政策，运动内部出现路线分歧，部分激进团体转向对“复归”本身的批判，质疑其未能真正带来自治与去殖民^[4]。1972年冲绳名义上“复归”日本，运动在形式上实现目标，但驻日美军基地依然存在，制度主权受限，引发冲绳民众对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广泛反思。作为冲绳最具组织性与合法性的群众运动，“复归”运动在社会整合、网络动员、话语塑造等方面均为后续反基地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冲绳社会运动的外部环境与制度张力

（一）美军二元统治体制下的合法性危机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军在占领冲绳后不断调整对冲绳的政策和统治架构。尤其是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以此为依据，确立了长期占领的“晴空政策”^①。然而，这种叙述更多是从美国政府的视角出发。若从冲绳民众的视角来看，美军由战争结束初期所寄予的“秩序重建者”角色，逐渐转变为压迫性统治的实施者。这一角色认知的演变与美国军事统

① “晴空政策”即“只要远东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就有必要保持对冲绳现有的控制程度”。参见：“杜勒斯访问日本并提出归还奄美群岛的建议（1953年8月8日）”，出自细谷千博等编：《日美关系资料集1945—1997》，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232页。

治策略的长期化、制度化密切相关。

占领初期, 冲绳社会对美军的认知曾一度十分复杂。部分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 基于美军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和提供战后救济的经历, 以及独立论者对脱离日本统治的期望, 曾将美军视为潜在的合作对象^{[22]37}。然而, 美军很快确立了长期占领冲绳的方针, 并推行以军事利益为核心的强硬政策, 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随着时间推移, 冲绳民众逐渐认识到, 与受战争影响较轻并经历一定程度民主改革的日本本土相比, 处于美军统治下的冲绳社会存在着显著的差距。面对美军愈发强硬的征地政策, 冲绳民众的抗争情绪不断高涨, 最终掀起了一场“全岛上下的斗争”。这场规模遍及全冲绳的社会运动, 成为冲绳民众对抗美军统治的标志性事件。

二战后, 美国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韩国、菲律宾、希腊等地。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因反美民族主义、反战和平、生态环保等理由爆发过反美基地运动, 但大多数运动要么短期内达到高潮后迅速消退, 要么因形势变化而逐渐平息。相较之下, 冲绳的反基地运动已经持续数十年, 成为一种跨越几代人、长期延续的社会现象。这种特殊性与冲绳极高的军事基地承载率密切相关,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军统治在冲绳缺乏合法性, 导致民众的反抗情绪长期积累并不断爆发。

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 归根结底取决于该国体制化一般社会运动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有效将社会运动纳入体制化轨道, 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就会显著降低; 反之, 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可能会因无处释放诉求而走向极端, 进而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从西方的经验来看, 一个国家体制化社会运动的能力, 主要取决于其国家性质及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23]。在这一背景下, 美军在冲绳建立的统治及其二元架构的合法性问题尤为关键。然而, 这里的“合法性”并非学者常从国际法角度讨论的美军对冲绳占领或托管的法律依据, 而是指冲绳民众对美军统治权力来源的接受程度及其认可与否。

国家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包括意识形态、制度程序和治理绩效三大方面。成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建构能够为民众提供精神依托和道德归属感, 使其认同国家的价值体系; 制度程序合法性则通过赋予民众政治参与感和公正感, 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 而治理绩效合法性则体现在国家通过提供各类具有“实惠”性质的公共品, 满足普通民众的实际需求, 从而增强对国家的支持^[24]。

美国在其他国家拥有众多军事基地, 通常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基地所在国之间的问题, 主要由美国国务院与所在国外交部协商处理, 必要时美国国会也会参与其中^[25]。然而, 与此不同, 冲绳的政治架构显得格外特殊。在冲绳, 驻地美军不仅承担军事职能, 还负责琉球群岛的民事管理工作。为了减轻美军的民事管理负担, 同时维护其“民主灯塔”的国际形象, 并安抚冲绳民众以避免国际舆论的批评, 美国在冲绳设立了以军事工作为主的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 同时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由冲绳本土民众组成的琉球政府(图2)。然而, 这种权力的“下放”本质上只是美军为更有效地维护冲绳军事基地功能, 而对冲绳民众做出的有限妥协。

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与琉球政府共同构成了美军在冲绳的二元统治架构。表面上, 这种

架构体现为民政府和琉球政府两个权力机关，并以“赋予冲绳民众自治权”为标榜，但实际上，绝对权力掌握在民政府手中。由冲绳民众组成的琉球政府虽设有行政机关、立法院和裁判所，但三权无法独立运作。琉球政府的首脑——行政主席及副主席，均由民政府的民政副长官直接任命，民政府还掌握着琉球政府公职人员的任免权^①。此外，民政府有权审查并修改琉球裁判所的判决，甚至可以否决琉球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从根本上限制了冲绳民众的实际自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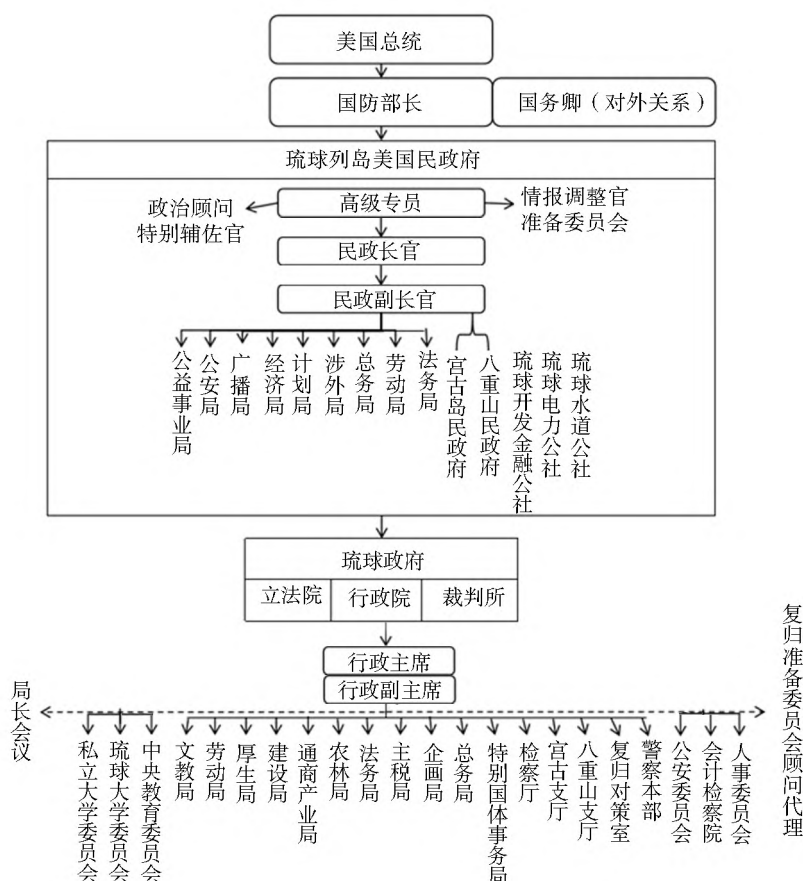


图2 美军治下冲绳政府组织结构示意图 (1972.2.1)^[26]

通常情况下，托管制度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管理，其目标是协助托管地区逐步实现自治或独立。因此，托管区的政治制度往往具有临时性，旨在为向更稳定的自治或独立政府过渡创造条件。然而，美军基于军事利益的考量，一度提出永久占领冲绳的“晴空政策”，使美国

^① 为明确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体制中民政长官、副长官及高级专员之间的职权关系，现简要说明如下。1950年12月，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改组为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在1950年至1957年间，琉球列岛美国民政长官形式上由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任，实际权力则集中于兼任琉球列岛司令部司令的民政副长官手中。1957年6月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颁布第10713号总统行政命令，在国防部长统辖下设置“驻琉球列岛美国高级专员”职位，得到总统批准后由国防部长任命中将级军官担任。高级专员为美国在琉球的最高行政与军事代表，其权限可授予其指派的民政长官及副长官。

在冲绳的托管机构呈现出强烈的军事和殖民特征, 完全背离了托管制度的初衷。

美军统治的军事色彩, 主要体现在其核心任务和目的始终是维护并确保美国在冲绳军事基地的功能。同时, 历任统治机构的首脑均由现役美国军人担任。虽然美方标榜赋予冲绳民众“自治权”, 但一旦涉及美军的军事利益, 民政府随时可以撤销或代行琉球政府的职权, 美国“军事利益至上”的统治原则从未改变。殖民色彩则体现于民政府对琉球政府的绝对控制。民政府实质领导人——民政副长官及后来的高级专员, 不仅拥有随意罢免琉球政府公职人员的权力, 还对“特别职位”的公务员享有“特殊任命权”, 并能对涉及美国人的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 甚至可随意延缓或中止审理中案件移送至民政府的裁判所^{[2]349-350}。例如, 1955 年 9 月, “由美子事件”即美军军官奸杀 6 岁少女案件发生后, 美军以“保护涉事士兵权益”为由, 拒绝将嫌疑人移交琉球政府的裁判所。该事件引发冲绳社会强烈愤慨, 要求公开审理案件并要求废除美军的治外法权^{[20]126}。此外, 琉球政府的各项活动必须严格遵循民政府及此前军政府发布的布告、布令和指令, 任何违反者都将受到干预或制裁。

在冲绳, 美军军事优先逻辑下的治理结构与其宣扬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矛盾。此外, 美军的二元统治架构严重忽视了冲绳民众的政治权利和诉求, 导致程序合法性缺失。这种合法性危机引发了冲绳人民对美军统治的强烈不满, 成为推动反美运动发展的重要动力。

与此同时, 相较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美军在冲绳实施的统治虽具有封闭性, 但在某些方面为冲绳社会提供了有限的政治空间。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日本中央政府在冲绳推行同化政策, 冲绳社会被严格纳入中央集权体制, 地方政治参与受到极大限制, 社会运动的空间几乎为零^[27]。而美军统治下, 尽管存在军事利益至上的二元统治结构, 但其间接统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冲绳社会精英和民众提供了表达政治诉求的机会。这种既非完全开放、亦非彻底封闭的政治环境, 构成了典型的“半开放性”政治机会结构。艾辛格在其研究中指出, 在完全开放或完全封闭的系统中, 抗议活动的发生率较低, 而在“半开放性”系统中, 抗议活动更为频繁^[28]。这种环境既给予民众表达不满的渠道, 又因制度性的限制激发了民众更强烈的抗议动机。冲绳的政治环境正体现了这一特征: 美军设立的琉球政府在形式上赋予了冲绳民众一定的自治权, 但实际上关键权力仍掌握在美军手中, 民众的政治诉求难以通过正式渠道得到回应。这种“半开放性”结构既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又因制度性的障碍导致了民众不满情绪的积聚, 最终促使社会运动的爆发。

(二) 国际压力的增强与冲绳问题的外部化

另一个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加强冲绳民众政治地位的因素, 是源自美国与苏联在新兴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力之争中所产生的冷战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根源于该国所宣称的民主价值观与其在冲绳殖民主义现实之间的明显冲突。

1955 年 1 月 14 日, 《朝日新闻》在社会版刊载了题为《美军治下的“冲绳民政”——

令人震惊的事实》的专题报道，详细揭露了美军在冲绳强制征用农地以建设军事基地的做法，批评军用地政策“一坪地租连一瓶可口可乐、一根香烟都买不起”。报道还指出当地劳动者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和人权问题，真实传达了冲绳居民的愤怒与不满^{[20]145-148}。这一“朝日报道”是根据自由人权协会应美国国际人权联盟主席鲍德温的请求所进行的调查而成的，可以说是一则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的“独家新闻”。该报道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朝日报道”刊发后不久，在印度举行的亚洲法律工作者会议上便提及冲绳问题。此外，在1955年4月的亚洲国家会议上，冲绳方面得以派代表参加。这标志着冲绳问题开始被纳入国际反殖民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论述体系，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揭露美军海外基地扩张的重要话语工具之一^[29]。

冲绳社会运动亦紧跟国际趋势，积极运用反殖民主义话语进行抗争，吸引更多的国际关注，也为冲绳反美社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政治机遇。其代表性事件便是引发国际关注的“二·一决议”。该决议是琉球政府立法院于1962年2月1日通过的《要求返还施政权的决议》。起草者在文中援引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批评美国对冲绳的统治违反“领土不扩张”与“民族自决”原则，并指出其对冲绳的施政权控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托管统治的规定，亦无视联合国成员国日本的主权平等。该决议明确要求美国尽早归还冲绳施政权，并将文件送达日本首相、参众两院议长、美国总统、美国国防部长、驻日大使以及联合国所有成员国^[30]。

对琉球政府立法院的议员而言，该决议不过是延续社会抗议的一项表态；但在美国政府看来，它却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指责美式殖民主义的突破口。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批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并加入联合国，国际社会掀起新一轮反殖民主义浪潮。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殖民地解放宣言》，明确要求立即、无条件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次年，联合国设立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不仅开展劝告与通过决议，还接受殖民地人民请愿，甚至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审查。

在这一波全球性政治运动推动下，美国对冲绳的统治逐渐暴露出战略脆弱性。美国政府担忧苏联可能借反殖民主义名义团结未独立或不发达国家，进一步孤立和分裂西方阵营，配合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战略^[31]。西方阵营中的主要盟国如英国和法国仍拥有大量殖民地，而美国对盟友的殖民问题采取容忍态度，已经促使部分新兴亚非拉国家向苏联靠拢。若苏联以反殖民主义发起外交攻势，美国对冲绳的统治便可能成为攻击美国殖民主义的突破口。这种担忧在肯尼迪政府的外交规划中有所体现，例如，美国国务院为肯尼迪总统准备的联合国应对方案中明确提到“在殖民主义即将迎来消亡之际，美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了殖民主义国家的阵营……冲绳可能成为美国（殖民主义）的丑陋象征”^[32]。冷战紧张局势加剧了美方对冲绳反对运动的关注与应对意愿——即便并非出于理想主义，也至少因其可能带来的重大国际宣传后果而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不仅使冲绳民众在与美军政府角力的过程中得

到了更大的议价空间, 也给日本政府介入冲绳问题创造了机会。

(三) 日美夹缝中的冲绳诉求博弈

在政治过程理论视角下, 国家或制度行为者的回应并非外在静态变量, 而是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重要政治机遇来源。这种回应并非脱离运动本身而独立发生, 而是受到运动本身构成的“威胁”或“机遇”的影响, 其本质是对运动正当性与成本收益关系的重新评估^{[7]164}。冲绳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在结构性压制下逐步扩展其政治机会, 正是在美日两国分裂性的政策张力中寻得了行动空间。

对日本政府而言, 冲绳运动所提出的“复归”日本的目标不仅未对日本政府构成实质性威胁, 反而激发了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同胞愧疚”情绪。这种基于民族共同体想象的道义动员, 显著降低了日本政府回应的政治成本, 提升了其有限介入的正当性。战后初期, 日本对冲绳事务基本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名义上坚持“剩余主权”, 实际上却主动接受美国对冲绳的施政安排, 默许其对冲绳事实上的永久占领^[33]。然而, 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土地斗争”愈演愈烈, 以《朝日新闻》等为代表的全国性媒体开始深入报道岛内抗争, 使得冲绳问题迅速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冲绳问题由此从边缘化的地方议题转变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在国会辩论中, 政府如何介入并协调日美关系以解决冲绳土地争端, 成为争相讨论的核心; 在舆论场上, 全民对冲绳的声援也日益高涨, 各地纷纷以“支援同胞”为名, 向冲绳捐赠学习用品和图书, 形成了一场跨地域的民间支援运动^[32]。面对舆论与选举压力, 日本政府虽在名义上坚持“剩余主权”, 但实际上不得不从最初的搁置与回避立场转向有限度介入: 接纳访日请愿团、在国会讨论土地问题、表达对“复归”的象征性支持等。1961 年池田勇人与肯尼迪的联合声明^{[16]523, 544-545}, 更明确表达了日本参与冲绳社会事务的意愿。在随后“冲绳新政策”的推动下, 日本政党、国会议员与媒体以制度性方式介入冲绳问题, 为冲绳地方社会提供了请愿、发声的渠道与法律资源, 也间接扩大了运动的制度议价空间。

与此同时, 在冲绳治理问题上, 美国政府内部长期存在明显分歧。国务院主张在维持基地使用前提下, 通过改善冲绳民众生活、扩大自治权以及加强与日本政府合作, 缓解岛内紧张局势, 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相对而言, 军方更加强调军事战略利益, 坚持排除日本介入, 维护美军对冲绳的单方面统治地位^[34]。肯尼迪政府提出的“冲绳新政策”, 原意是通过“日美协调”和“扩大自治”回应冲绳社会的不满情绪, 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陷入困境。代表军方立场的卡拉维拒绝落实政策中的自治措施, 否决琉球立法院通过的财政改革法案, 加强对琉球政府的直接控制, 削弱其政治权限。这种“直接统治”做法很快引发了冲绳岛内的广泛反对, 不仅遭到革新派批评, 也导致长期与美军合作的冲绳自民党出现分裂, 其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动摇了美军在冲绳统治的根基^[35]。1964 年卡拉维卸任后, 美方被迫改派文官任高级专员, 并接受琉球政府民选主席体制的建立。这一系列调整为冲绳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制度空间, 也使“复归日本”的诉求在此后几年内迅速发展, 最终成为冲绳政局的主流

方向。

在日美双方对冲绳治理立场分歧逐渐加剧的背景下，冲绳地方政治力量逐步调整其抗争策略，将原本碎片化、诉诸局部利益的社会不满，引导至以“复归日本”为核心的统一政治诉求上。与其单方面反对美军统治或诉求生活改善，不如通过明确政治目标，倒逼日本政府承担起象征主权的实际责任。此后，冲绳民众虽处于美军统治下，却不再仅将自身视为军事占领的对象，而是有意识地将“复归”主张嵌入国家认同、宪政保障等宏大叙事，提升了运动的政治正当性与制度影响力。在日美立场分歧造成的政策缝隙中，冲绳社会逐步明确了诉求方向，争取话语空间，并为后续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与行动奠定了基础。接下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冲绳社会开始经历一场更深层次的认知变化，重新理解自身所处的结构位置与抗争的意义。

四、冲绳社会运动的认知动员与话语构建

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理论指出，社会运动的兴起需经历“认知解放”——即边缘化群体对现存秩序正当性的质疑、对变革可能性的评估，以及通过集体行动框架整合分散诉求的过程^{[7]164}。冲绳的“复归”运动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证：从美军统治初期的认同混乱，到 20 世纪 60 年代诉求的统一，冲绳民众通过动态的认知重构，将殖民压迫的日常经验升华为全岛性的抗争共识。

（一）从“解放者”到“殖民者”的叙事重构

美军统治初期，冲绳社会陷入深重的认同混乱与国家归属危机。由于日本政府将冲绳视为“弃子”，冲绳人的民族认同虽强，但国家认同却高度模糊。一时间，“独立论”成为岛内政治主张的主流，反映出部分精英希望摆脱日本殖民历史、重塑政治定位的愿望。在这一语境中，美军一度被视为“解放者”。这种认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相较于在冲绳岛战役中迫使民众集体自杀的日军，美军在战后提供救济、恢复秩序，被赋予“解放”的正面意义；二是美军的到来瓦解了日本在琉球的殖民统治结构，使原本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的冲绳精英看到了掌握政治命运的可能。此外，一些支持独立的群体中也不乏试图讨好美军、推动冲绳脱离日本、实现单独占领的投机主义者。

这一时期，岛内主要政党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冲绳人民党主张效仿巴拿马成为美国保护国；冲绳民主同盟明确支持建立独立的琉球共和国；冲绳社会党则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永久托管统治^{[22]34-39}。这些论调的核心逻辑在于，将岛津藩入侵以来的历史解读为日本对冲绳的歧视性统治，并将美军的到来视为一种广义的“解放”，为冲绳的独立或高度自治提供正当性。然而，这种幻想很快在美军的军事统治下破灭。随着“旧金山和会”召开，美国确立了对冲绳的长期占领方针，接连推行强征土地、治外法权等措施，使“解放者”迅速转变为“殖民者”。冲绳民众开始意识到，所谓“解放”，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变体，而“独立”在美军绝对控制下毫无可能。“独立论”的破产，迫使冲绳社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

重新寻找出路。

在此背景下,“复归日本”逐渐显现为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抗争路径。这一转变并非出于单纯的民族情感,而是独立愿望幻灭之后的理性选择。美军的军事至上主义不断激发民众的反抗意识,而冲绳人复杂的身份结构,也成为重构政治立场的基础。在异族统治的背景下,冲绳民众强化了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要求民族统一的朴素情感,成为“复归”运动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

在经历过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同化统治,冲绳人身份认同变得极为复杂和多元,但不可否认,认同日本国家的人口比例相当可观。例如,被称为“复归男”的仲吉良光,基于对“日琉同祖论”的信念,以“人的自然情感”向美军陈情要求“复归”日本。1951年5月由“复归日本促进期成会”和“复归日本促进青年同志会”发起的有关要求“复归”日本的签名活动,征集到近20万冲绳人民的签名,占当时冲绳选民总数的72%^[36]。无论是出于对日本教育的延续认同,还是对美军统治的反感,“复归”主张在冲绳社会迅速获得广泛支持。

可以说,美军统治初期的“琉球独立论”,虽试图通过历史叙事对抗日本的同化遗产,却未能回应民众对现实安全与经济需求的迫切需求。当冲绳社会认清美军统治在制度程序、意识形态、治理绩效等层面均缺乏合法性后,转而走上抗争之路。

(二) 经济差距与“复归”可行性的理性建构

“复归”日本这一选择并非出于情感冲动,而是基于对现实条件和前景的理性判断。其中,日本宪法第九条所倡导的“放弃战争权”,对饱受战争创伤的冲绳民众产生了强烈吸引力。作为一部明确规定“放弃战争权”的和平宪法,对冲绳社会而言,不仅具有法律上的保障意义,更象征着一个远离战争阴影、通往和平未来的制度性承诺。因此,1968年屋良朝苗在竞选行政主席时,将“复归”与“永久和平”紧密联结。他以明确的政治主张提出:“我们应当作为日本国民,回归祖国,在和平宪法的庇护之下生活。”^[37]

与此同时,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复归”主张的关键动因。独立论者认为日本经济依赖美援,民主化程度不及美国,“复归”不仅无助于发展,还可能失去现有援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10%,缔造了全球资本主义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

相较之下,冲绳虽也实施了“自由企业制度”“琉球复兴金融基金”,并采用美元作为流通货币等经济政策,发展却远不及日本本土。美国政府虽然定期向冲绳提供经济拨款,但这些拨款首先用于基地建设等军事用途。且《普莱斯法》^①规定对冲绳的援助金额上限为600万美元,美军已将这些援助用于维持基地建设,难以对经济民生进行有效支持^[38]。第三任驻琉高级专员卡拉维曾多次呼吁提升援助额度,试图缩小冲绳与日本其他地区之间的生活

① 《促进琉球群岛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之法律》(Act to Provide for Promo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yukyu Islands),规定以每年600万美元的限度向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因由众议院议员查尔斯·M.普莱斯(Charles M. Price)提案而通称为《普莱斯法》。

差距，以稳固美国统治。他指出，日本政府向贫困县提供财政转移支付，冲绳民众自然设想若归属日本，也能获得类似援助^{[20]375}。表 1 清晰展示了在美军统治下冲绳与日本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表 1 冲绳与日本其他各都道府县人均收入比较^①

1955 年日本（含冲绳）人均收入排行			1958 年日本（含冲绳）人均收入排行		
都道府县	人均收入/B 圆	与日本平均收入之比/%	都道府县	人均收入/B 圆	与日本平均收入之比/%
1—东京	52 177	173.4	1—东京	66 297	171.4
2—大阪	42 552	141.4	2—大阪	57 144	147.7
3—神奈川	36 615	121.7	3—神奈川	50 002	129.3
4—兵库	35 612	118.4	4—兵库	48 422	125.2
5—爱知	35 110	116.7	5—爱知	45 239	117.0
.....					
43—茨城	21 786	72.4	43—熊本	26 255	67.9
44—岩手	21 156	70.3	44—岩手	25 615	66.2
45—宫崎	19 609	65.2	45—宫崎	24 609	63.6
46—冲绳	18 981	63.1	46—鹿儿岛	22 890	59.2
47—鹿儿岛	17 436	58.0	47—冲绳	21 887	56.6
平均值	30 084	100.0	平均值	38 677	100.0

冲绳民众因经济落差产生的“复归”诉求亦成为 1961 年池田勇人与肯尼迪总统会谈时的重要论据。池田强调，尽管日本不干涉美国对冲绳的统治，但“（美国）应当对冲绳民众的经济需求给予更多关注，至少应当保证他们能取得与日本较为贫困县人民同等的待遇”^[39]。他以鸟取县为例，指出其 90% 财政来自中央政府，而冲绳则主要依赖地方税与有限援助，这种差距成为“复归”压力的重要根源。

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揭示了冲绳社会认知转变的机制。所谓“相对剥夺感”，指的是群体价值满足的“应然”和“实然”差异所引发的张力，且这种张力可能会促使人们走向抗争^[40]。随着日本经济腾飞，冲绳民众愈发意识到自身被排除于共同繁荣之外，“若回归日本，亦可共享经济红利”的想象由此浮现，进而产生一种“发展型相对剥夺感”。更关键的是，这种经济落差并非仅止于民众的直观体验，而是在舆论与政治动员中被不断建构为“殖民剥削”的象征性指标，进而转化为对“复归”诉求的集体认同与动员基础，推动了认知解放的发生与传播。

这一认知转变标志着冲绳社会从消极接受走向积极抗争。然而，若要将个体觉醒转化为广泛社会运动，还需通过话语资源的整合，完成从意识提升到实践动员的跃迁。

① 本表数据单位为 B 圆（美军于 1945 年到 1958 年 9 月间在琉球群岛所发行的军票）；数据来源于琉球银行调查部：《战后冲绳经济史》，琉球银行，1984 年，第 322 页。

（三）反殖民、反战复合话语的框架整合

在冲绳民众逐步认同“复归日本”作为集体行动路径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的实现，即冲绳民众通过有意识的战略努力，形成共享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以此来合法化和激励集体行动^[41]。冲绳的“复归”运动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范本——它通过嫁接反殖民、反战的多元叙事，将地方性抗争升华为具有全球共鸣的道德议题。

“复归”话语在策略上融合了“日琉同祖论”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承诺，从而有效将原本支离破碎、矛盾重重的身份认同转化为可用于动员的合法性资源。通过强调血缘上的“同属日本”，冲绳运动获得了本土舆论的支持；而借助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权”的和平象征，又为冲绳社会提供了摆脱军事统治的制度性愿景。同时，冲绳民众也以反殖民话语严厉批判美军在地统治：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揭露其以基地建设为核心的殖民式资源掠夺，削弱了冲绳本地的自主经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则从政治与文化角度谴责美军构建的“二元统治”体制将冲绳变为被异族统治的殖民地，深刻压制了其自治权和文化身份。通过援引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冲绳县议会于1961年通过的“二·一决议”明确指出，美军对冲绳的统治构成“对民族自决权的粗暴践踏”，使美方在冷战意识形态格局中陷入尴尬与被动^[42]。

在此基础上，“复归”运动进一步嵌入战后国际社会日益高涨的和平主义与反战话语体系中，形成了一个有着广泛共鸣的动员平台。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战争的全面升级，冲绳作为美军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前哨，其军事功能愈发凸显。大量美军B-52轰炸机从冲绳起飞直接轰炸越南战场，使得冲绳不再只是基地的所在地，更成为战火的始发点和加害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现实激起了岛内的强烈不安与愤怒。冲绳民众在忍受噪声污染、军机事故、土地被强征与美军士兵犯罪等身心双重创伤的同时，也日益觉察到被卷入了一场无关自身意愿的战争之中。反战情绪由此与反殖民诉求产生共振，并逐渐构筑出一套有力的集体动员话语。在1965年4月28日的“冲绳复归海上大会暨祖国复归要求县民总动员大会”上，通过了《抗议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决议》，明确谴责美国在越南地区的军事干预，认为美国这一行为无视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是卑劣的行径^[43]。这一政治声明，标志着冲绳“复归”运动不仅是争取自治与国家归属的区域性政治诉求，更成为全球反战运动浪潮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映照出冷战体制下被压迫区域在全球结构中的反应与能动。

冲绳“复归”运动通过整合民族认同、经济剥夺与战争压力三重叙事，成功构建出一套具有广泛动员力的抗争话语体系。这一“框架整合”过程不仅重塑了民众的世界观，也为集体行动赋予了正当性与道德基础。然而，认知转变只是社会动员的起点。要将抗争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还需借助有效的组织机制与社会网络，推动社会运动从“觉醒”走向“实践”。下文将转向组织动员的角度，分析冲绳如何实现这一跃迁。

五、冲绳社会运动的组织结构与动员机制

一个解释性过程，导致一群人将感知到的环境“威胁”或“机会”赋予极大意义，并不保证运动的出现。为了使集体对“威胁”或“机会”的归因能够转化为关键的集体行动，解释者必须拥有足够的组织和人数，以提供动员的组织基础。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意识形态上的挑战便与更狭义的组织性挑战结合在一起。作为行动的前提，潜在的活动家——无论是“挑战者”类型还是“成员”类型——必须创建一个组织载体及其支持的集体身份，或者利用一个现有的组织及其所依托的常规集体身份^[7]。

（一）制度性组织资源的运用

冲绳社会运动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特殊的组织结构与动员方式。在美军二元统治体制下，琉球政府及地方自治机关虽然被美军赋予“半官方”地位，却因其制度嵌入性与群众基础，反而成为抗议动员的重要依托。与一般社会运动中通常由被建制完全排斥的边缘群体发起不同，冲绳的社会运动由琉球政府及各级市町村政府这些具有制度资源的组织主导。这种特殊情况赋予冲绳社会运动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使得“土地斗争”及随后的“复归”运动得以顺利发展为覆盖全岛的大型社会运动。

1948年7月21日，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向琉球群岛所辖各岛民政府知事下达《第26号指令（市町村制）》，要求在地方组建市、町、村机构。琉球群岛的市、町、村行政区域划分，基本沿袭了二战前日本冲绳县的行政结构^[44]。美军通过地方自治制度间接统治冲绳，目的是避免美军军政府与琉球居民直接接触，从而减少美军统治带来的不适感和冲突风险。然而，这一地方自治体系——包括中央的琉球政府和地方政府——不仅未能成为美军统治的维稳工具，反而成为冲绳社会运动的核心组织架构，在实践中演化为冲绳各地培育横向联系的地方动员网络。

在“土地斗争”中，琉球政府作为自治政府，发挥了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关键作用。自1953年起，美军加紧基地建设，实施强制征收居民土地和“一次性支付地租”的征地政策，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对。琉球政府立法院率先发起了反对征地的行动。1954年4月30日，琉球政府立法院一致通过“关于军用土地问题的立法院决议”，确立了四项原则，称为“守土四原则”：反对一次性支付地租、要求完整赔偿土地价格、对土地征收造成的破坏进行补偿、反对征收新土地^{[20]122-123}。同时，琉球政府行政府、立法院、市町村长会和军用土地联合会成立了四者协议会，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组织网络。在美国发布全面否定“守土四原则”的“普莱斯劝告”后，四者协议会决定总辞职，并计划召开居民大会，派遣代表赴日本。6月16日，随着运动持续升温，民主党、人民党、冲绳教职员会、冲绳青年联合会、土地联合会、冲绳市町村长会等16个团体成立了军用地问题解决促进联络协议会，推动贯彻“守土四原则”。6月20日，全冲绳64个市町村中的56个市町村召开居民大会，有16万到40万民众（占全体人口的20%至50%）参加^{[22]87-95}。这一组织模式表明，体制内建制结

构并非社会运动的天然对立面, 在特定条件下, 反而可能成为推动抗议扩散的制度通道。

(二) 社会力量的抗争联动

除了制度性资源提供的纵向组织支持, 冲绳社会运动的持续发展更有赖于横向的社会联动结构。正如上文所述, 在“土地斗争”过程中逐步扩大的动员主体, 既包括琉球政府与市町村等建制力量, 也涵盖了教职员会、青年联合会等民间中层组织。这些组织虽分属不同领域, 却能围绕特定抗争议题建立协同机制, 有效突破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边界。事实上, 这种横向协作模式正是冲绳社会动员的一个关键特征, 并在“土地斗争”高峰期初步成型。随着抗争的升温, 各类社会团体跨界组建联络机制, 逐步形成覆盖多阶层、跨领域的社会动员网络。

然而, 从大众社会理论的视角来看, 冲绳的这种动员模式却显得格外特殊。康豪瑟在其《大众社会政治》中即指出, 社会中若存在丰富多样的中层组织, 例如福利与慈善团体、利益集团、俱乐部与兴趣小组, 它们通常能有效制衡精英权力, 提供理性交流的平台, 并使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换言之, 发达的中层组织能够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发挥“缓冲”作用, 从而降低一个社会发生超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45]。冲绳的现实却成为该理论假设的重要反例。在美军占领统治的压抑性结构下, 原本被视为维稳中介的中层组织并未发挥缓冲功能, 反而转化为社会动员的支点。当统治结构缺乏合法性且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时, 这些组织由于深嵌于日常社会生活, 与基层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反而成为表达不满、整合诉求的关键平台。

1966年6月16日, 第四任高级专员沃森发布命令, 要求将琉球上诉裁判所正在审理的两件案件的裁判权从该法院移送至民政府的裁判所^{[20]576}。对于如此高压且不合常理的命令, 反对裁判权移送的抗议浪潮席卷全岛。不仅立法院、法官系统集体发声反对, 革新各政党、市町村长会、琉球大学学生会、教职员会、守护儿童会、劳动组合联合会等25个政党与民间团体还组建了“裁判移送撤回共斗会议”, 发表声明, 组织连署, 召开集会, 形成横跨政治、教育、劳工与市民社会的联合阵线^{[20]577-578}。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冲绳社会抗争并不依附于单一阶层或利益集团, 而是在面对象征殖民统治的不正义事件时, 能够迅速实现多元群体的横向联动。军用土地的主人与知识分子共存于抗争阵线之中, 劳工团体与学生组织并肩呼吁司法正义, 教师与母亲会一同强调人权保障。不同群体虽诉求各异, 却能在关键节点上实现框架整合, 形成高密度、广覆盖的动员结构。

随着抗争经验的积累, 冲绳社会逐步将这种横向联动制度化, 并在“复归”运动中发展出以“复归祖国协议会”等平台为代表的常设协调机制。这不仅表明冲绳社会已具备整合多元力量的成熟能力, 也意味着社会运动已从零散化的抗议行动, 转化为具有稳定组织基础和清晰目标框架的政治力量。

(三) 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路径

如果说横向联动提供了冲绳社会运动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组织活力, 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动员力量并未止步于街头抗议或象征性表达, 而是逐步构建起通往制度内部的反馈

路径。冲绳社会运动的组织力量不仅体现在动员能力和横向整合上，更表现为其在抗争过程中持续推动制度变迁、塑造政治议程的能力。

在冲绳“复归”运动逐步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中，民众为争取行政主席公选制度所展开的斗争，是推动组织力量实现制度化的重要一环。1964年第三任驻琉高级专员卡拉维“直接统治”政策引发政治危机后，美方为缓和局势，撤换卡拉维并派遣文官沃森担任高级专员。虽然此举一度缓解了岛内紧张局势，但冲绳社会对于自治权的追求并未止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冲绳社会各界持续要求行政主席由民选产生，并以集会、请愿等方式不断向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施压。地方议会也陆续通过要求实现主席公选的议案，最终促使美国在1968年首次允许冲绳举行主席直接公选^[22]143-187。

1968年4月，教职员会会长屋良朝苗作为革新派的候选人参选琉球政府行政主席，并提出“立即、完全、无条件复归”“反基地·反安保”“日本宪法适用”“建设和平经济”四项纲领。他明确表态要超越党派立场，代表全体县民推进“复归”事业。在随后的公选中，屋良获得除自民党外各革新政党、工会、农渔民组织、妇女团体、学生社群和知识界的广泛支持，成功当选为第五届琉球政府行政主席^[46]。屋良政权的组织支持基础显示出强烈的民意导向与制度转化能力。其当选后并未将抗争退场，而是通过行政权力继续推进B-52、毒气武器等的撤离运动，以及与日本教育制度一体化、自立型经济发展等政策议题。此外，屋良朝苗在具体协商中亦充分代表冲绳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1969年11月，他向佐藤首相递交《诉求书》，强调“即刻无条件全面返还”的愿望，并强烈反对在“返还”名义下维持美军基地现状的安排。他强调，若“复归”不能伴随美军基地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制度保障的全面适用，冲绳民众将难以接受一个“形式归还、实质不变”的安排^[47]。该建言充分体现了冲绳社会运动自下而上对制度正义与安全保障重新界定的集体诉求，也反映出其力图通过体制内路径推动“复归”议程、实现制度化转化的政治努力。

这种以选举制度为载体的动员机制，也推动了冲绳社会运动由抗议性集体行动向通过制度渠道参与治理转型的进程。冲绳革新阵营通过行政主席选举实现组织协作，结合议会行动与社会动员，形成制度内外互通的治理模式。这种制度参与路径提升了运动的合法性与议价能力，标志着冲绳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成熟，也为此后冲绳反对基地运动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实践模板。

结 语

作为二战结束后全球军事殖民体系的特殊样本，冲绳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抗争形成了独特的时空对话。回顾1945年至1972年冲绳社会的抗争路径可以发现，面对压抑性的外来统治与制度不公，地方社会通过组织网络的构建、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政治议题的重构，逐步建立起兼具街头动员与制度渗透能力的行动模式。本文以政治过程理论为分析工具揭示了冲绳社会运动在美军统治时期得以生成的深层机制：军事殖民统治带来的合法性赤字激发

了结构性抗争潜能, 地方自治结构成为组织嵌入的媒介, 而跨阶层的联动及认知解放则构筑了抗争的社会基础。这一动员逻辑造就了冲绳特有的抗争模式, 即制度外挑战与制度内渗透并行的双轨路径。

尽管 1972 年的“复归”在形式上完成了将施政权移交日本的安排, 但冲绳仍长期承受美军基地过密、自治权受限、政治表达受到抑制等结构性问题。2025 年冲绳县政府的调查显示, 冲绳本岛美军基地面积占比仍高达 14.6%, 以仅占日本 0.6% 的土地面积却承载着 70.3% 的驻日美军基地, 且有着远高于本土的基地相关犯罪率^[48]。自 1996 年普天间基地搬迁方案提出以来, 这场被日本政府标榜为“减轻冲绳负担”的工程, 却在近三十年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演变为新的冲突焦点。同时, 冲绳经济长期依赖基地补助与公共转移支付, 形成“基地依赖型经济”结构, 使得地方发展陷入“财政依附”与“自主性不足”的恶性循环^[49]。更重要的是, 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日本自卫队军事部署不断南移的背景下, 冲绳所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基地负担的再生产, 更是“战场化风险”的现实化。冲绳作为边缘地区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不仅未曾化解, 反而在新时代背景下以更复杂的方式重现。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 通过还原冲绳社会运动在军事占领体制下的生成机制, 揭示抗争行动如何在压抑体制中借助制度缝隙积聚力量, 达成社会动员。这一逻辑对于理解当今冲绳如何在“国家安全”逻辑下持续构建抗争正当性、重申地方自治价值, 仍具有启发性意义。重新审视当下冲绳的政治处境不难发现, 社会运动的形态虽已发生诸多变化, 其所依托的行动逻辑却依然延续着历史路径的某些核心特征。今日冲绳地方社会在基地搬迁、自治权争取、财政自主等问题上所展开的抗争, 虽然面临制度环境与国际局势的巨大转变, 但依然借重于多层级组织动员与跨领域议题整合, 持续通过制度渠道谋求政治回应。在这一过程中, 曾在“复归”运动中形成的制度参与传统和社会网络基础, 成为当代运动得以延续的组织遗产。

作为日本治理体系中高度例外的区域, 冲绳社会运动的发展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压迫, 也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重新塑造了其政治定位。在日本国家安全政策持续强化的背景下, 冲绳持续被作为战略布局的负担承载地。冲绳社会对“谁来决定”“安全为了谁”等问题的追问, 折射出其对日本政治运行逻辑的深刻省思。冲绳社会运动所展现的韧性体现了边缘社会对国家正当性的持续检视, 也为理解类似区域的社会运动逻辑提供了宝贵的观察视角。

[参考文献]

- [1]大野光明. 冲縄闘争の時代 1960/1970[M]. 京都: 人文書院, 2014.
- [2]小林武. 琉球政府期における「裁判移送」事件[J]. 愛知大学法学部法経論集, 2015(204): 345—392.
- [3]小林武. 「宮古島農民弾圧事件」と騒乱罪[J]. 愛知大学法学部法経論集, 2018(215): 121—145.
- [4]芝田秀幹. 戦後「冲縄」を巡る学生運動——1960 年祖国復帰期を中心に[J]. 冲縄法政研究所共同調査報告書, 2019(2): 25—53.
- [5]村岡敬明. 米軍統治下での「島ぐるみ闘争」における冲縄住民の意識の変容[M]. 岡山: 大学教育出版, 2023.

- [6] MCCARTHY J, ZALD M.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 Morristown: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3: 2.
- [7] MCADAM D. Political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M].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8] 西德尼·塔罗.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M]. 吴庆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3.
- [9] 查尔斯·蒂利. 社会运动, 1768—2004[M]. 胡位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4—5.
- [10]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2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
- [11] 王晓升. 新社会运动“新”在何处——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思考[J]. 学术月刊, 2011, 43(2): 13—21.
- [12] 沖縄県公文書館. 海軍軍政府布告第1号「権限の停止」[DB/OL]. (1945) [2025-05-20]. https://www2.archives.pref.okinawa.jp/opa/OPA600_RESULT_BUNSYO.aspx?cont_cd=A000007663&src_keyword=%e6%b5%b7%e8%bb%8d%e8%bb%8d%e6%94%bf%e5%ba%9c%e5%b8%83%e5%91%8a%e7%ac%ac%ef%bc%91%e5%8f%b7&keyword_hit=%e6%b5%b7%e8%bb%8d+%e8%bb%8d+%e6%94%bf%e5%ba%9c+%e5%b8%83%e5%91%8a+%ef%bc%91+%e5%8f%b7&lang=jp.
- [13]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SC13/3: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Japan[DB/OL]. (1975) [2025-05-0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7p2/d70>.
- [14] 沖縄県公文書館. Directive for 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DB/OL]. (1950) [2025-05-21]. <https://www3.archives.pref.okinawa.jp/RDA/ryusei/RDAP000035/index.html?title=%E6%A5%B5%E6%9D%B1%E8%BB%8D%E5%8F%B8%E4%BB%A4%E9%83%A8%E6%8C%87%E4%BB%A4%2Ffar%20East%20Command%20Directive%20&page=1>.
- [15] DULLES J. John Foster Dulles's Speech at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Conference[EB/OL]. (1951) [2025-05-21]. <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Jpus/19510905.S1E.html>.
- [16] 細谷千博, 石井修. 日米関係資料集 1945—1997[G].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9.
- [17] 沖縄県公文書館. Civil Administration Proclamation No. 13: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DB/OL]. (1952) [2025-05-21]. <https://www3.archives.pref.okinawa.jp/RDA/data01/RDAP000033/index.html?title=%E7%B1%B3%E5%9B%BD%E6%B0%91%E6%94%BF%E5%BA%9C%E5%B8%83%E5%91%8A%2FCivil%20Administration%20Proclamation%201950%E5%B9%B4%EF%BD%9E1957%E5%B9%B4%E3%80%80%E7%AC%AC001%E5%8F%B7%EF%BD%9E%E7%AC%AC039%E5%8F%B7&page=114>.
- [18] 沖縄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 沖縄大百科事典: 中巻[M]. 沖縄: 沖縄タイムス社, 1983: 328.
- [19] 琉球政府文教局. 琉球史料第4集: 社会編 1[M]. 那覇: 那覇出版社, 1959: 327.
- [20] 中野好夫. 戦後資料・沖縄[G]. 東京: 日本評論社, 1969.
- [21] 村岡敬明. 屋良朝苗の政治思想の形成——教員時代と行政選挙を主席通じて[J]. 東アジア共同体・沖縄(琉球)研究, 2021(2): 53.
- [22] 新崎盛暉. 沖縄現代史[M]. 胡冬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 [23] 赵鼎新.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J]. 社会学研究, 2005, 20(1): 171.
- [24] 赵鼎新.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J]. 学术月刊, 2016(8): 170—177.
- [25] 陈静静. 美军统治琉球群岛的历史考察[J]. 军事历史研究, 2019(4): 102.
- [26] 照屋栄一. 沖縄行政機構変遷史: 明治12年—昭和59年(1879—1984)[M]. 沖縄: 照屋栄一, 1984: 109.
- [27] 李若愚. “旧惯温存”——日据冲绳初期统治方式研究[J]. 日本学刊, 2015(2): 109—127.

- [28]EISINGER P K.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3,67(1):11—28.
- [29]橋本理恵子.1950 年代の「沖縄問題」報道における「朝日報道」の歴史の意義の再構築[J].21 世紀社会デザイン研究,2022(21):136.
- [30]沖縄公文書館.日本政府衆参両院への陳情要請書 1962 年[DB/OL].[2025—05—20].https://www2.archives.pref.okinawa.jp/opa/OPA600_RESULT_BUNSYO.aspx?cont_cd=R00156478B&src_keyword=R00156478B&keyword_hit=R00156478B&lang=jp.
- [31]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Main Trends in Soviet Capabilities and Policies,1957—1962[DB/OL].(1998)[2025—05—20].<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19/d161>.
- [32]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 for President Kennedy: United States Strategy at the Sixteenth General Assembly[DB/OL].(2001)[2025—05—20].<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25/d174>.
- [33]陈静静.战后日本对琉球政策变迁与日美同盟强化——基于结构暴力的分析视角[J].国际政治研究,2022(1):121—124.
- [34]陈静静.美国对琉球政策历史演变的研究(1945—196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120—121.
- [35]宮里政玄.アメリカの沖縄統治[M].東京:岩波書店,1966:213—228.
- [36]林泉忠.沖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十字路——“祖国復帰”と“反復帰”のイデオロギー的性格を中心に[J].政策科学・国際関係論集,2004(7):39.
- [37]屋良朝苗.沖縄の夜明け・いのちを守る闘い[M].東京:あゆみ出版社,1969:176.
- [38]松田賀孝.戦後沖縄社会経済史研究[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312.
- [39]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he Ryukyu Islands[DB/OL].(1996)[2025—05—20].<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22/d338>.
- [40]泰德·罗伯特·格尔.人们为何造反[M].冯伟,译.台北:南天书局,2019:35、76.
- [41]SNOW D A,ROCHFORD E B, WORDEN S K,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6,51(4):464—481.
- [42]沖縄公文書館.施政権返還に関する要請決議[DB/OL].(1962)[2025—05—21].<https://www3.archives.pref.okinawa.jp/RDA/ryusei/R00156478B/index.html?title=%E6%97%A5%E6%9C%AC%E6%94%BF%E5%BA%9C%E8%A1%86%E5%8F%82%E4%B8%A1%E9%99%A2%E3%81%B8%E3%81%AE%E9%99%B3%E6%83%85%E8%A6%81%E8%AB%8B%E6%9B%B8%201962%E5%B9%B4>.
- [43]沖縄公文書館.アメリカのベトナム侵略戦争に対する抗議決議[DB/OL].(1965)[2025—05—20].https://www2.archives.pref.okinawa.jp/opa/OPA600_RESULT_BUNSYO.aspx?cont_cd=R00001012B&src_keyword=RDAE006471&keyword_hit=RDAE006471&lang=jp.
- [44]沖縄公文書館.軍政府指令第 26 号 Organization of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市町村制資料画像[DB/OL].(1948)[2025—05—21].<https://www3.archives.pref.okinawa.jp/RDA/data01/RDAP000006/index.html?title=%E8%BB%8D%E6%94%BF%E5%BA%9C%E6%8C%87%E4%BB%A4%20Military%20Government%20Directive%201948%E5%B9%B4%E3%80%80%E7%AC%AC001%E5%8F%B7%EF%BD%9E%E7%AC%AC040%E5%8F%B7&page=272>.
- [45]KORNHAUSER W.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M].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9:74—102.
- [46]槌屋裕司.初期屋良政権と「沖縄返還問題」:「沖縄ネーション」の選択[J].経済環境研究,2020(9):1—19.
- [47]沖縄公文書館.佐藤総理大臣に訴える 琉球政府行政主席 屋良朝苗 B51[DB/OL].(1969)[2025—05—21].https://www2.archives.pref.okinawa.jp/opa/OPA600_RESULT_BUNSYO.aspx?cont_cd=R00001012B&src_keyword=RDAE006471&keyword_hit=RDAE006471&lang=jp.

tps://www3.archives.pref.okinawa.jp/RDA/ryusei/R00001198B/index.html?title=%E4%BD%90%E8%97%A4%E7%B7%8F%E7%90%86%E5%A4%A7%E8%87%A3%E3%81%AB%E8%A8%B4%E3%81%88%E3%82%8B%20%E7%90%89%E7%90%83%E6%94%BF%E5%BA%9C%E8%A1%8C%E6%94%BF%E4%B8%BB%E5%B8%AD%20%20%E5%B1%8B%E8%89%AF%E6%9C%9D%E8%8B%97%20%20B51.

[48] 沖縄県知事公室基地対策課. 沖縄の米軍及び自衛隊基地(統計資料集)令和 6 年 5 月[EB/OL].[2025-05-08].

https://www.pref.okinawa.lg.jp/_res/projects/default_project/_page_001/029/383/r6.5_toukeisiryousyu1.pdf.

[49] 田凯, 郭花. 冲绳美军基地与经济振兴的悖论——基于补偿政治的视角[J]. 日本学刊, 2023(6): 111-136.

[责任编辑 孙 丽]

A Study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Okinawa During the US Occupation and Rule Period

JIANG Zhishi¹, HU Peng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2.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 Following the Battle of Okinawa in 1945, Okinawa endured 27 years of U. S. military occup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local social movements exhibite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broad scale, sustained duration, and complex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alysis through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reveals that the primary drivers lay in the U. S. military's dual governance model centered on military interests. This model suffered legitimacy crises across ideological, procedural, and performance dimensions. In practice, this model suppressed the space for local autonomy and deepened residents'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reby fueling widespread and enduring social resistance. On this basis, Okinawan society gradually developed a protest network characterized by both breadth and institutional penetration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embedding within the local autonomy framework, cross-class alliances, and flexible protest discourse strategies. The experience of Okinawa's resistance not only provides an important example for understanding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peripheral areas, but also provides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contemporary anti-base movements and local autonomy struggles.

Key words : Okinawa; social movements; U.S. military bases;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